



钟山风雨急

 古都北平，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发出向全国大追剿的命令

1949年4月，妩媚的春色装点着古老的北平城。

和风习习，杨柳依依，黄鹂声声。

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北平，这座几个月以前还有上百万大军在这里对垒的古城，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战场上厮杀了两年多的国共两党，将在这里举行和平谈判。

全中国注视着北平。

全世界注视着北平。

是战？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最大规模的战争何去何从，将在这里做出选择。

中南海勤政殿的大厅里，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侧各摆了一排椅凳，供谈判的正式成员坐靠。长条桌两侧的后面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参加会谈的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的座位。

4 月 1 日，国共和谈在这里开始举行。

晚上 9 时，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从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南京政府代表团由张治中率领，从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

会谈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是 4 月 1 日到达北平的。

在此之前，国共两党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9 年 1 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

国民党的全部兵力这时只剩下 220 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 100 多万人。而在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它的正规军达 430 万人，所以，当时蒋介石和他的总参谋长敢夸下海口：“中央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全部消灭共产党！”

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相反，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急剧增长。全面内战之初，人民解放军只有 120 万人。三大战役结束后，增加到 400 万人以上，其中野战军 210 万人。很多部队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实现了美械化。

南京政府不但在军事上打了败仗，而且在财政经济方面已陷入崩溃的绝境。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它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

一向骄横固执的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被打败了。

在美国的压力和桂系的“逼宫”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引退”。

桂系的领袖李宗仁，在 1948 年竞选中当上了副总统，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权。蒋介石“引退”，他成为代总统。

1 月 22 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第二天，李宗仁即派黄启汉、刘仲容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联系国共和谈之事。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接见了黄、刘两人，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要黄、刘两人告诉李宗仁：如果李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当迅速同蒋介石决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

然而，李宗仁正是想走中间道路，试图通过国共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保有江南半壁江山。

当黄启汉回到南京汇报时，李宗仁高兴地说：“总算很快搭上了关系。”接着，这位代总统又很快采取了几个步骤：

2月13日，授意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年龄均过七旬的名士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

3月24日，南京政府宣布：组成“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由张治中任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后又增加刘斐）。

4月1日，一架大型客机从南京机场起飞。飞机载着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向北平飞去。

这时退居在溪口的蒋介石，也希望“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但却不甘心于和平。他特别担心真能“划江而治”，让桂系据有半壁江山，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的计划是：备战求和，以整饬军事为重。他派汤恩伯和顾祝同两员心腹大将，一人主管长江防务，一人在江南编练新兵，组成二线兵团，企图以军事对垒来保住江南半壁。

3月29日，当张治中赴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和谈方案时，蒋表示没什么意见，只是要张一切要当心。当张治中要离开时，蒋远远地送了一程。结果还是蒋太子经国露了底，说：“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

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洞若观火。

当 1949 年元旦就要到来之时，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针对美国 and 南京政府正在筹划“和谈”和“划江而治”的计谋，毛泽东告诫革命的人们，不要学古代希腊寓言中那个怜惜毒蛇的农夫，以免被毒蛇咬死。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装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毛泽东表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记住了这个农夫的教训，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1949 年 1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1949 年和 1950 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了以渡江南进、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

1 月下旬，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2 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颜惠庆等“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并向他们表示：中共方面对和谈代表人选和谈判地点允予考虑，3 月 15 日左右可望决定。

双方在会谈中确认：

“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3月19日，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北平六国饭店会见黄启汉，向他透露：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正式和谈，并暗示 he 可以先向李宗仁打个招呼。

3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南京政府：和谈从4月1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代表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随后又增加聂荣臻）。

4月1日谈判开始后，从4月1日至12日这段时间，双方代表以个别交谈的方式进行谈判：周恩来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

交谈一开始，周恩来即严肃地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解释说：“蒋介石虽然退到溪口，但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达成协议也没什么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对这种解释不满意，说：“这种做法只会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4月2日晚，周恩来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里接见了李宗仁驻北平的代表黄启汉。

周恩来带着愤怒的表情，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双方谈判的基础问题，南京的代表除邵力子外，都异口同声地不接受“惩治战犯”这一条，这是不是南京方面变了

卦，不承认以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

二是张治中来北平前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那么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周恩来气愤地说。

黄启汉表示第二天即回南京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明白。

4月3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前，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他，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只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是，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

“你回去后请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这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

最后，周恩来以坚定的语气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在和谈之后，能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李在南京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黄启汉回到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主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

外号“小诸葛”的白崇禧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

他还说：“如果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李品仙认为：“共产党的话不能听。”

李宗仁看到诸将的态度，无可奈何。

北平城里，和谈的双方代表在紧张地进行个别交换意见的工

作。

4月8日，住在京西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分别约见了南京方面的各位代表，交换了意见。

正在长江北岸准备渡江的二野、三野百万大军指战员，眼见长江汛期一天一天地临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飞过江去。

为了争取和谈成功，4月11日，中央军委不顾长江汛期即将来临，电告渡江战役总前委将预定渡江时间推迟一个星期。

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这份草案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它根据毛泽东于1949年1月确定的八项条件，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具体条款。

当晚9时，中共代表团和南京代表团进入中南海勤政殿，在十分严肃的气氛中开始正式谈判。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

他对草案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周恩来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明确历史的责任。

在回顾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历史和战争发展的过程后，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事实很清楚，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负担。因为这个草案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定这个责任。”

接着，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说：“12天来受到中共方面十分周到的接待，双方充分交换意见，尤其是承中共中央毛主席的亲切会见和谈话，十分兴奋和感谢。”

“关于战争的责任，我们很了解这个问题。国民党是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愿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承认。”

张治中提出：“在多次交谈中，对战犯问题我已希望不要写成条文，会见毛泽东先生时我又再次陈述了意见，毛先生表示了很

大的让步。我今天还是坚持希望不写成条文。如必要写，能否把文字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谁背叛和平，才应追究。但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这个问题而僵持。”

对草案中的其他 7 条，张治中也逐条提出了看法。

最后，双方同意作会外协商，然后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

4 月 14 日，双方代表团都抓紧时间研究草案。

南京代表团提出了 40 多处修改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

当天晚上，张治中把修正案面交给周恩来。两人在一起又谈了许久。

4 月 15 日，双方代表又分别交谈，希望能达成一致意见，但进展不大。

晚 7 时，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

晚 9 时，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

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稿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定案。张文白先生说要派人带回南京请示，我们希望回南京去的先生给我们转达，我们期望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并说服南京政府接受这个协定。”

“我们肩负历史使命，全国人民看着我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看着我们，希望协定早日签订，和平早日实现。”

然后由张治中发言。他说：“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对这个协定仅作了初步研讨，来不及作结论，还是要慎重研究后再派人去南京请示。”

谈到个人的想法，张治中感叹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

最后，张治中表示：“我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新时代，共同担当新

的历史责任。”

听完张治中一番话，周恩来指出：“我们认为南京代表团、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乃至南京当局是会同意这个和平协定的。当然，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晚上 10 时 20 分，会谈结束。

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后，鉴于时间紧迫，又连夜把南京代表团成员召集在一起，对《国内和平协定》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代表团提出的 40 多条修正意见，中共方面大都接受了。特别是第一条关于战争罪犯问题，先后删去了“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把南京政府和所属军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一句也改了。所以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从协定全文看，虽然条件过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保全者实多，对国民党也并非不利，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为好。

商议的结果，南京代表团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推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两人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黄、屈两人在第二天飞回南京。

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赶到机场欢迎。

南京傅厚岗 69 号，李宗仁的代总统官邸。

黄绍竑一下飞机，就被接送到这里。

李宗仁和桂系诸将领都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竑，等待着他把《国内和平协定》拿出来，以先睹为快。

但是，黄绍竑并未马上拿出《国内和平协定》，而是先就谈判

的情况作了一番说明。

黄绍竑提醒说：“我们国民党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 1925 年的地位，也不同于 1937 年时的地位了。大势如此，有谁能改变？谈判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李宗仁看完《国内和平协定》后，没表示什么。

白崇禧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

说完，站起来向外走了。

第二天，李宗仁、何应钦在总统府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国内和平协定》。

张群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去奉化溪口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看了《国内和平协定》，竟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在蒋的示意下，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包括所谓和谈指导小组成员，在 4 月 19 日、20 日两天连续举行会议，通过了对中共《国内和平协定》绝不能接受的声明，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

此时，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团成员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南京的答复。

4 月 21 日凌晨，他们才盼来了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李、何表示完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而且还要代表团向中共建议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

代表团略作讨论之后，就仓促地照抄了一份电文稿，于上午 9 时送给中共代表团。

国民党南京政府，又一次失去了走向光明的良机。

等着它的是覆灭的命运。

张治中声称要赶回南京去“复命”，周恩来代表中共恳切挽留，

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深为感动。随即，中共地下党把张治中的家属送到北平。

南京代表团成员除了个别先回南京、新疆处理事务外，没有一个人坐南京政府的飞机回去。

这是中外和谈史上少有的事。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4月21日，北平，一个和暖的春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大追剿的命令：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

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从此，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大军，在中华大地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展开了一场大追剿的军事行动。

如滚滚洪流，冲涤着浊水污泥；
似疾劲秋风，扫荡着残枝枯叶……

 长江，一条巨龙，它托起百万大军，圆成中华民族统一的美梦

雄伟的唐古拉山，雪峰重叠。

各拉丹东主峰的西南侧，几股冰雪融成的雪水涓涓流出。然后，它吸流纳川，身子越跑越粗壮。它时而在山峰间喧哗，时而在峡谷里咆哮。过了宜昌，滔滔江水挣脱了巫山的约束，又似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奔流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最后注入大海。

长江奔流，日夜不息。
它孕育了华夏文明。

大诗人杜甫面对汹涌东去的长江水，曾感叹道：

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
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
色借潇湘阔，声驱滟潏深。
未辞添雾雨，接上遇衣襟。

浩浩长江，悠悠岁月，演出了多少悲欢盛衰的历史剧！

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四月的时候，长江上，又出现了惊天动地的一幕。

江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一个极端腐败衰落的政府，一支吃尽败仗的残兵队伍，还在顽抗挣扎。

江北，天时地利，政通人和。百万正义之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正在备船练兵，准备随时飞渡长江，攻略江南。

大战前的气氛是最紧张的，也是最平静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之后，南京政府的精锐之师丧失殆尽。

蒋介石如一个输了血本的老赌棍，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这位在总统椅子上还没坐满一年的总统，不得不发表“求和”声明，又不得不宣布“下野”。

但是，他仍然手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大权。

他不愿把江南半壁江山拱手交给共产党。

于是，他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心腹汤恩伯专任总司令，由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

蒋介石又给其他几名心腹委以要职：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

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

蒋介石又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

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 40 个师，25 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 75 个师，约 45 万人。

蒋介石还秘密制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

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

蒋介石、汤恩伯等人的计划是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这一作战方针，南京国防部的许多官员不知道，白崇禧也不知道，甚至连代总统李宗仁都不知晓。

当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指示南京卫戍总部作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时，汤恩伯却正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走。

南京孝陵卫汤恩伯的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大卡车，准备随时逃离。

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同时，也在筹划渡江战役。

早在 1948 年 12 月 12 日，中央军委即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电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讨论。

这个电报机密度相当高，只发到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即焚毁。

军委的计划是：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

南和浙江、福建两省，还有江西的一部分。

12月17日，军委电示：请刘伯承、陈毅两人来中央商议渡江问题。

12月19日，刘、陈北上，至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村，随即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后，刘、陈、邓和总前委即以主要精力筹划渡江作战。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兼）。各兵团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军共9个军，另野战军直属五十八军（后又成立十九军）。

同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瑞龙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15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各兵团下辖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军共16个军。

1949年2月8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计划采取5个兵团从江阴至扬中、南京东西、芜湖东西、铜

陵至贵池、安庆东西等地一线展开、同时渡江的战法。二野的另两个兵团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以 5 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渡江时间初步确定为 3 月底，即雨季未来、春汛未发之时。

3 月上、中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定下 4 月 10 日为发起时间。

这时，刘伯承刚从中央回到二野，留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粟裕因指挥淮海战役时操劳过度而病倒，在济南住院。

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判断，美国在解放军渡江时出兵干涉的可能性较小，但也要有所准备，以防万一。二野、三野并肩直指东南，就是准备在必要时对付美国的干涉。渡江时间越短，消灭敌军越多，江南解放得就越快，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3 月下旬，三野、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人分批乘火车南下，进驻蚌埠南郊孙家圩。

总前委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确定：

二野、三野全部于 4 月 15 日开始渡江；

二野之三、四、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

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和县金河口之间渡江；

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渡江战役的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这次会议的精神被整理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经邓小平、陈毅审阅，并由邓小平修改定稿。

《纲要》于 4 月 1 日送至中央军委，4 月 3 日被批准。

4 月 1 日，邓小平、陈毅率领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来到合肥东南的瑶岗村，正式开始对渡江作战的指挥。各突击集团的指挥部也同时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就在这时，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中共代表团与他们的谈判有很大进展，南京政府有签字的可能。

如能和谈成功，武装强渡改为和平渡江，那意义的重大不言而喻。为此，中央军委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

但从部队基层反映上来的情况却十分严峻：

二野的指战员认为：长江水势 4 月末 5 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反映的意见是：4 月下旬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亲自调查的情况表明：5 月的长江水比 7、8 月还要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即使签字，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鉴于上述情况，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既要考虑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必须顾及渡江客观情况的严峻。4 月 15 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 15 日渡江推迟至 22 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 7 天时间。”

百万大军渡江作战，面临的一个很大困难是：指战员们大多数来自北方，是“旱鸭子”，不习水战。一坐上小船，头就发晕。

想当年，曹操几十万人马因不习水战，被敌方施以连环计，以